

中國佛教史卷四

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

(一) 概說

近世佛教，乃就有清一代，及民國以來佛教興衰言之；清代康熙乾隆二帝，盡力振興儒教；對於佛教，亦頗提倡。喇嘛教本爲元明二代之懷柔藩部政策；其寺院之配置，僧侶之階級，廩餼之額數，皆有定制。清代所護喇嘛，皆黃衣派；而稱本國固有之佛教徒爲青衣派。然順治雍正二帝之參禪；乾隆帝之翻譯經典；則於固有之佛教，關係至深；可謂清代佛教之全盛時期。嘉慶以後，國勢凌替，佛教亦隨之衰頹。至光緒年間，士夫競談變法；輸入西洋哲學，推翻墨守儒說之成見；同時研究佛學之風，亦勃然興起。民國以來，戰亂不息，人心覺悟，研究佛教者，乃不期而同；創設佛教會，刊刻經典，各

省皆有此機關焉。

(二) 清代之喇嘛教

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，已於第十六章述之。清制：喇嘛分駐京喇嘛，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，而皆受前藏達賴喇嘛之管轄。喇嘛官秩：達賴、班禪以下，有札薩克、蘇拉、德木齊、格斯貴等名。駐京者，設掌印札薩克大喇嘛一人，副札薩克大喇嘛一人，札薩克喇嘛四人，達喇嘛十七人，副達喇嘛四人，蘇拉喇嘛十九人，教習蘇拉喇嘛六人，德木齊三十一人，格斯貴五十人；其徒衆曰格隆，曰班第。內務府三旗，及東陵隆福寺、西陵永福寺，皆設置喇嘛若干人。此外熱河、盛京、五臺山、歸化城、多倫諾爾等處，咸設喇嘛；額缺升轉，皆照駐京喇嘛之例。

順治八年，創建後黃寺，雍度喇嘛百有八人。十四年，後寺中，奉經喇嘛，定爲四百人。雍正帝在藩邸，卽喜研內典，受國師章嘉呼土克圖之指導。及卽位，興修此邸，號雍和宮，爲京師第一大廟；設王大臣管理之。宮內中正殿，爲喇嘛誦經之所；定例：每日以

二十人，在前殿唵吉祥天母經；以九人在後殿，唵無量壽佛經；以三人在後殿，唵龍王水經。

乾隆元年，議准在京各寺廟，原有度牒之喇嘛、格隆、班第，共九百五十九名。後增建福祐寺，食錢糧之格隆、班第，共三百十四名；皆未得度牒，乃按名補給。其額外所收之徒，遇食糧有缺，方予充補。

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尼分主前後兩藏。乾隆時，理藩院造冊，至第六世達賴，所轄寺廟，計有三千一百五十餘所；共計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餘人；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；共計喇嘛一萬三千七百餘人。

(三) 清代對於佛教之保護及限制

滿洲民族，早崇喇嘛教，與蒙古相似。清初諸帝，對於佛教，頗示尊崇；故保護亦備至。雍正御選語錄『有云：我朝之初居東土也，風俗淳古，實忠實孝；歷代敬禮佛天；而於僧道，並無不問高下，一概尊敬之事；與蒙古習尚迥殊。』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，非

漫無區別，一概盲從者也。

清代一方尊重佛教；同時於寺觀之建置，僧尼之薙度，又嚴加限制。順治年間，定僧道官制，京師設僧錄司、左右善世、闡教、講經、覺義、掌釋教之事；各直省府屬設僧綱司；置都綱一人、副都綱一人；州屬曰僧正司；縣屬曰僧會司；各掌其屬釋教之事，悉依明制。

對於寺觀庵院之建立，所定限制，甚爲嚴厲。大清律例戶律中，規定：『凡寺觀庵院，除現在處所外；先年額設不許私自創建增置；違者杖一百；僧道還俗，發邊遠充軍；尼僧女冠入官爲奴；地基材料入官；民間有願創建寺觀者，須呈明督撫具奏，奉旨，方許營建。』

又出家亦悉依明代以來舊制，須由官給度牒，不許任意出家。大清律例中亦有規定：『若僧道不給度牒，私自簪雍者，杖八十；若由家長，家長當罪；寺觀住持，及受業師私度者，與同罪，並還俗。』然此項限制，事實上乃因僧道無戶籍，可免納丁稅而設；

自雍正年間，併丁稅於漕糧，僧道之多寡，與稅額無何影響；於是度牒之制，遂無形而廢弛。

又『民間子弟，戶內不滿三丁，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，俱有罪；應付火居等僧道，不准濫受生徒；其年逾四十者，方准招徒一人；如年未四十，即行招受，及招受不止一人者，均照違律論罪。』

此等限制，定例雖嚴；然其後亦爲具文，僧徒隨意出家，比比皆是；或窮乏不能自存，則遁入空門；甚至犯罪者，亦藉寺廟爲藏匿之地；古人所謂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，至是寢失其本意矣。

（四）清初諸帝之信佛

（甲）順治帝之參禪

順治帝自統一中原以後，一改滿洲專崇喇嘛之舊習，而歸依禪宗，頗致力於參究；觀其與玉林琇和尚，及其弟子茆溪森和尚之關係，可以知之；玉林名通琇，係臨濟

第三十一世，卽磬山圓修之弟子也。順治十五年，曾下敕諭，特遣使迎接玉林，有云：『爾僧通秀，慧通無始，智洞真如，掃末世之狂禪，秉如來之正覺。』又十六年敕諭有云：『爾禪師通秀，臨濟嫡傳，笑巖近裔，心源明潔，行解孤高，故於戊戌之秋，特遣皇華之使，聘來京闕，卓錫上林。朕於聽覽之餘，親詢釋梵之奧，實獲我心，深契予志。洵法門之龍象，禪苑之珠林者也。』其尊崇可謂至矣。玉林至京，順治帝卽於萬善殿，請師昇座說法。後迎入西苑，時時問答，遇合之隆，一時無比。旣而玉林堅請還山，帝許之，留其首座。茆溪行森，問答稱旨。賜玉林號爲大覺普濟禪師，茆溪爲明道正覺禪師。

然順治帝之參禪，乃自憨璞和尚始。宗統編年載憨璞和尚住京都海會寺，都門宗風自此大振。順治帝因狩南苑，幸海會，延見憨璞和尚，始與禪宗接觸云。

順治十四年冬，十月，海會憨璞性聰和尚結制萬善殿，先是上狩南苑，因幸海會，延見聰，奏對稱旨，復召入禁庭，問佛法大意，乃詔結冬萬善殿，賜明覺禪師號。上後謂天童忞曰：朕初雖尊崇象教，而未知有宗門耆舊，知有宗門耆舊，則自憨璞

始；愍璞固有造於祖庭者也。

順治帝自愍璞奏對之後，乃留心參究；既有玉林師弟，復召玄杲和尚，說法於內庭。十六年冬，天童道忞和尚，奉召入京，進見於萬善殿，傳諭免禮，賜坐，慰勞敘譚畢，卽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。帝親至方丈問法，時苕溪森、玄杲、愍璞聰，皆承召對。十七年，道忞還山，帝親送出北門，賜號宏覺禪師。

帝於座右大書：『莫道老來方學道，孤墳盡是少年人。』以自警惕，與禪門耆學相見，不令稱臣致拜，從容握手，情逾師友；可知帝之參禪，必有心得，非一知半解者也。

（乙）康熙帝之崇佛

康熙帝在位六十年，對於儒教及各種學術，均積極整理，成康熙字典及數理精蘊，象考成等鉅著；而對於佛教，亦稟前代成規，特加保護。二十三年，南巡，臨揚州之天寧、平山二寺，各有題詞；天寧曰蕭閑，平山曰怡情；至金山，勅重加修建，親製文勒石紀之；書扁額曰江天一覽；此外所至江南名刹，多有題詞。二十八年，二次南巡，至蘇州。

鄧尉山聖恩寺，親拈香禮佛，賜額曰松風水月；至靈巖，賜書翠嵐二字；復至杭州之靈隱雲棲，而回江寧大報恩寺等處，所至遇山林學道之士，優禮有加。又曾發帑重修補陀羅迦普濟寺，親製碑記，有云：『海寇猖狂，寺宇梵刹，皆爲灰燼；自康熙二十二年，蕩平臺灣，海波永息，朕時巡浙西，特遣專官，虔修淨供，敬書題額，永鎮山門；復發帑重建寺宇，上爲慈闈延禧，下爲蒼生錫祉。』又親製重修天竺碑文，有云：『能仁之量，等於好生；佛道之成，關乎民隱；將使般若之門，隨方而啓；仁壽之域，舉世咸登。』康熙帝自言弱齡誦讀經史，未暇覽金經貝葉之文；觀其所作碑記，乃抱儒釋一致之思想，固未若順治之能親領禪悅，而其尊崇佛教，則猶先代之遺風也。

（丙）雍正帝之參禪

雍正帝於禪門，頗有造詣；自言得力於西藏喇嘛章嘉呼土克圖；茲節引御選語錄卷十八後序文於左：

朕少年時，喜閱內典；惟慕有爲佛事；於諸公案，總以解路推求，心輕禪宗；謂如來

正教，不應如是；聖祖勅封灌頂普慧廣慈章嘉呼土克圖喇嘛，乃真再來人，實大善知識也；梵行精純，圓通無礙；藩邸清閒，時接茶話者十餘載，得其善權方便，因知究竟此事。

帝之爲此言，蓋初時惟知從佛教經典上研求，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，與一般學人所犯之病相同；及接近國師，而方能省悟也。帝曾於康熙年間，延禪僧迦陵性音，屢爲結制；帝著力參究，偶有省悟；性音讚爲大悟徹底；帝不自信，叩問章嘉，章嘉則不許之，更勉其進步。故帝於章嘉，極端信仰，稱爲證明之恩師。

帝自號圓明居士，曾輯古來禪師語錄中之提持向上，直指真宗者，編爲十九卷，名御選語錄。而以自己與人問答言句，收錄於第十二卷，頗多奇拔之語。茲錄一二則於下：

衆生不了，猶如小兒放風箏相似；隨風放去，風定卻復收來；收來放去，實同兒戲。何日是了期？所以古德每拈云：『脚跟下紅絲斷也未？』此語甚親切；譬如風箏

線斷，紙鳶落在何處？參。

學人初聞道，空境易，空心難；究竟則空心易，空境難；空境而不空心，到處爲礙；空心而不空境，觸途成滯；應知心外復有何物可空，物外復有何心可空，所以云：『我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；』少有分別心，則非第一義；若不如是，必不能守。

帝於即位之後，又在內廷與王大臣參究禪理，集此等諸人之語錄，亦爲一編，名曰御選當今法會，附於御選語錄之十九卷。

帝旣喜研禪理，又極提倡淨土，蓋鑒於禪門空洞之弊，而欲矯正之，示學人以腳踏實地之修行也。其於淨土祖師，特提蓮池大師，以爲模範；御選語錄中，採其要語，別爲一卷；帝自製序文有云：

達摩未到梁土以前，北則什公弟子，講譯經文；南則蓮社諸賢，精修淨土；迨後直指心傳，輝映震旦；宗門每以教典爲尋文解義，淨土爲著相菩提；置而勿論，不知

不覺，話成兩橛；朕於肇法師語錄，已詳言宗教之合一矣；至於淨土之旨，又豈有二；……曹溪十一傳而至永明壽禪師，始以淨土提持後學；而長蘆北磻諸人，亦作淨土章句；及明蓮池大師，專以此爲家法；倡導於浙之雲棲；其所著雲棲法集一書，皆正知正見之說；朕欲表是淨土一門，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，不致歧而視之，誤謗般若；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，刊爲外集，以示後世。

雍正帝之重要著述，有御選語錄十九卷；及揀魔辨異錄八卷；御選語錄分正集、外集、前集、後集之四類；其正集中所採語錄，爲僧肇、永嘉覺、寒山、拾得、潞山祐、仰山寂、趙州諗、雲門偃、永明壽、雪竇顯、圓悟勤、玉林琇、苕溪森十三人；而以道教之祖師紫陽真人張平叔及自己所著圓明居士語錄，加入之；外集則採雲棲蓮池大師語錄；前集、後集，則採達摩以下歷代禪師之語錄；末卷更附刻當今法會；由此編次之意觀之；正集中以張平叔與諸禪師並列，以示紫陽之由道入釋；於古代佛教中，特冠以羅什門下之僧肇，最後則又附入雲棲，蓋有調和教禪淨三宗之意焉。

中國佛教史
至於揀魔辨異錄，乃爲天童圓悟禪師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，標立邪說，有背師旨；悟禪師曾有闢妄救略說以駁斥之；而法藏之弟子弘忍，復作五宗救一書，以迴護邪說；故帝特作此書，逐條駁正之，并將藏內所有法藏弘忍之語，及五宗原五宗救等書，盡行毀板；其所頒上諭有云：

法藏之言，肆其臆誕，誑世惑人，此真魔外知見；如魔嗣弘忍，中其毒者，復有五宗救一書，一併流傳，冀魔說之不朽，造魔業於無窮；天下後世，具眼者少，不知其害，即有知而闢之者，有德無位，一人之言，無徵不信；……朕爲天下主，精一執中，以行修齊治平之事；身居局外，並非開堂說法之人，但既深悉禪宗之旨，洞知魔外之情，灼見現在魔業之大，豫識將來魔患之深，實有不得不言，不忍不言者。

帝蓋鑒於明末禪門黨同代異之弊，徒在知見上逞機鋒，而忘卻向上一著，故慨乎言之；觀御選語錄後序中，性音勸帝研辨五家宗旨，帝謂五家宗旨，同是曹溪一味，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，可知帝乃不承認有五家之區別，而主張五家一致之說者；

其駁弘忍之五宗教，特就門戶之見最甚者斥之耳。上諭又云：

粵稽三教之名，始於晉魏；後世拘泥崇儒之虛名，遂有意詆黜二氏；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，問禮之意，猶龍之褒，載在史冊，非與孔子有異教也；佛生西域，先孔子數十年，倘使釋迦孔子接迹同方，自必交相敬禮……後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，謂某爲日，某爲月，某爲星；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礙之見；但於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，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；觀紫陽真人之外集，自可無疑於仙佛一貫之旨；道旣一貫，愈可以無疑於三教並行不悖之理；爰附及於此，使天下後世，真實究竟性理之人，屏去畛域，廣大識見，朕實有厚望焉。

由上言之：可知帝更主張三教一致之說者；以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之故事，引證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；并引隋李士謙以佛比日，以道比月，以儒比五星之說而修正之；此亦宋明以來三教合一論之影響，而帝之主張，更爲鮮明也。

（丁）乾隆帝之刻經事業

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興佛教，比諸唐宋開國時，亦無遜色。至乾隆帝則盡力於雕刻大藏經，及翻譯國語藏經等，亦偉大之事業也。明萬歷十七年所刊大藏，計六千七百七十一卷；乾隆三年，乃勅選後世大德著述，增入藏中，爲千六百七十二部，七千二百四十七卷，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錄；從事雕刻，卽所謂龍藏是也。然清代雕刻藏經，在康熙帝時，已編集圓覺、金剛、楞嚴、維摩、仁王、楞伽、深密、涅槃、心地觀、諸部般若等二十二經，在內府出版；此龍藏乃經始於雍正帝，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。彙刻書目第十九冊卷首釋藏之夾註下，有云：『我朝雍正十三年，特開藏經館，收奇黜妄，整理編刊；命和碩莊親王等董其事，至乾隆二年竣工，頒發各省寺院，誠鉅典也。』此可以爲證矣。

云：

乾隆帝又以滿洲語翻譯大藏經；衛藏通志卷首載御製清文翻譯大藏經序有

若夫訂四庫全書，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；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；旣而悔

之，恐難觀其成；越十餘載而全書成；茲未逮二十載，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藏。夫耳順古稀，已爲人生所艱致；而况八旬哉！茲以六旬後所創爲之典，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，非昊乾嘉庇，其孰能與於斯；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，更不知其當何如矣。

乾隆帝爲歷代帝王中壽命獨長之人，其訂正四庫全書，及國語翻譯藏經，經始於乾隆三十八年，卽六十二歲之時；四庫全書歷十餘年告成，翻譯藏經則費十八年之歲月，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；帝年已七十九歲，其得意欣悅之情，可想見也。又云：至於國語譯大藏，恐人以爲惑於禍福之說，則不可不明示其義；夫以禍福趨避教人，非佛之第一義諦也；第一義諦，佛且本無，而况於禍福乎；但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，故以因緣禍福引之，由漸入深而已。

是蓋說明佛教之第一義諦，本來空寂，超越於禍福之說；以禍福引誘衆生，使之趨避，乃佛教之方便說也。又云：

然予之意，仍並不在此；蓋梵經一譯而爲番（西藏）再譯而爲漢；三譯而爲蒙古；我皇清至中國百餘年，彼三方久屬臣僕，而獨闕國語之大藏，可乎？以漢譯國語，俾中外胥習國語，卽不解佛之第一義諦，而皆知尊君親上，去惡從善，不亦可乎？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，在此不在彼也。

由此觀之，乾隆帝以國語翻譯藏經之本意，可知矣。蓋自宋初倣唐制，設譯經館，歷元及明，均以刊印大藏經，爲國家事業之一；清室繼之，而有龍藏之編輯，意在超越前代，誇耀後世也。然元世祖命八思巴，始創蒙古新字；至武宗至大三年，召集藏蒙漢及西域學者，從西藏之大藏經，重譯成蒙古文，稱蒙古藏經；若清代無滿洲語藏經，則視元爲遜色；故乾隆帝汲汲圖之，而有三方皆爲臣僕，不可獨闕國語大藏之言也。至於藉翻譯藏經，希冀以國語普及中外人民，亦爲彼大一統之夢想也。國語藏經有一百八函，六百九十九部，二千四百六十六卷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帝曾命和碩莊親王允祿，選擇通習梵音之人，將全藏經中諸咒，

詳加訂譯；編爲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呪；計八十八卷，附同文韻統六卷；字母讀法一卷；讀咒法一卷，共九十六卷。當時頒發京城直省各大叢林，今則皆已不存，惟北京之雍和宮及觀音寺，各存一部，版藏內庭，亦已散失。近由居士徐文爵、蔣維喬、陳汝湜等發起，向觀音寺借得原本，由商務印書館影印流通。此四譯對照之全咒，亦乾隆帝一大事業也。

（五）嘉道以後佛教之衰頹

嘉慶道光之時，國勢中衰；當時佛教傳承，亦無前此之隆盛；而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學者，又墨守韓愈闢佛之成見，盡力排擊佛教；僧徒流品既雜，寺廟中幾爲遊民託足之所；遂致自暴自棄，日陷於衰頹而不可挽矣。在此期間，有可注意之二事：即太平天國之排佛，及居士之勃興是也。

（甲）太平天國之排佛

咸豐年間，洪秀全特起於廣西；建立太平天國；以耶穌教爲號召，自稱上帝之第